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郑振铎日记

上

郑振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郑振铎日记

上

郑振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振铎日记 / 郑振铎著; 陈福康整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ISBN 978-7-100-14972-3

I. ①郑… II. ①郑… ②陈… III. ①郑振铎(
1898—1958)—日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0196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郑振铎日记

郑振铎 著 陈福康 整理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72-3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8.75
定价: 228.00 元(全二册)

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

出版说明

在我国近百余年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并称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南北并峙,相互辉映。这一切均肇端于张元济。端赖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大批文人学者纷至沓来,先后加盟商务印书馆,如蔡元培、高梦旦、孟森、蒋维乔、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旋使商务印书馆在西学名著的译介、教科书的编撰、杂志的创办、文献的整理出版等诸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型文化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艰难岁月里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在我国近代文化启蒙事业上,厥功甚伟。

这些文人学者是那个时代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理解来规划和经营商务印书馆,使她的出版物不断提升和影响大众文化,反过来又促进精英文化的进一步升华,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思维方式、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精神就是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他们中的不少人留下了卷帙不一的日记,这些日记是对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录,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日记的解读,有助于加

深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全面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鉴于是,我们策划了《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不论是工作日记、生活日记,抑或是对历时较长事件的专门记录,只要是日记体形式,都是收入本丛书的对象。我们组织人员将这些日记整理、编辑、排印出版,以饗读者。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丛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甚至失误之处,希望同行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0月

整理者言

一

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藏书家。他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五四”以后以鲁迅为旗帜的进步文化界少数几位“全才”式的大师之一。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坛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最后,他是为国殉职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就是以他为核心发起组织的;三十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身中国著作者协会,他是最主要的组织者;后来左联解散,另行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时,他也是最核心的筹划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的全国文协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文联与作协,他都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另外,他在“五卅运动”时发起组织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秘密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抗战胜利后参与筹划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等,都是功垂史册的。

他先后主编过《学灯》《文学旬刊》^{〔1〕}《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各时期执全国文坛牛耳的核心报刊,还主编过《俄罗斯文学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库》《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有重大影响或学术价值的丛书。还主编过《新社会》《人道》《民主》《政协会刊》等政论刊物,以及如今享誉世界的《文物》《考古》的前身《文物参

〔1〕 现代文学期刊,初名《文学旬刊》,自1923年7月第81期起改名《文学》(周刊),1925年5月第172期起定名《文学周报》。

考资料》《考古学报》《考古通讯》等。

他著作等身。出版的创作有《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民族文话》《蛰居散记》《战号》等集子。学术论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痴庵集》《短剑集》《困学集》《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文探》《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汤祷篇》《劫中得书记》以及《西谛书目》《西谛书话》《西谛书跋》《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郑振铎文博文集》，等等。翻译的书有《海鸥》《六月》《贫非罪》《灰色马》《高加索民间故事》《沙宁》《俄国短篇小说译丛》《飞鸟集》《新月集》《太戈尔诗》《印度寓言》《莱森寓言》《民俗学浅说》以及译述的《树居人》《天鹅》《列那狐的故事》《竹公主》《恋爱的故事》《英国的神话故事》《希腊神话》，等等。在他罹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文集》，一共出了七卷而中辍。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全集》，共二十卷，总字数达九百五十多万字；但其实还不能算“全”，因为不仅有不少已发表的佚文、书简等尚未收入，还有大量未刊文稿及书信等尚未整理编入，其中就包括存世的一大半日记。

郑先生的一生如此重要、如此丰富多彩，他的日记保存尽管不全，但其重要价值当然也就无须多说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将郑先生存世日记全部汇总、整理、交付出版的志愿，如今，在郑先生哲嗣尔康老师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督促下，克服困难，终于要实现了。作为整理者，觉得有一些情况须在此向读者作点介绍。

二

郑先生生前，有过两种日记经他自己整理、取名、发表。

一是《欧行日记》，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为避难而游学国外的日记。1934年10月31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郑先生是1927年5

月21日乘船离开上海的。《欧行日记》从这一天开始,至8月31日止,仅三个多月,所记只是在船上和初到法国的日子。郑先生在出书时写的短序中说:“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能找到。”郑先生回到祖国的具体日子,我们以前一直未能确知;我曾经根据一些史料,考定他至迟于1928年10月已经回国,指出了叶圣陶先生晚年回忆有误(他说是1929年2月)。后来,才从王伯祥先生的日记中,确知了郑先生回到祖国的确切日子是1928年6月8日。因此,他的《欧行日记》本该记有十二个多月。从时间上说,他所发表的确实只有四分之一,这是非常遗憾的!(不幸中之小幸,是后来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点点未曾发表的日记,详见下述。)从《欧行日记》中可知,郑先生原本记有“原始日记”,又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抄录,寄给国内的高君箴夫人看。他在后来重新写录时,必然有所补充、修润。

另一种他生前整理发表的日记,名《求书目录》,为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以他有关抢救古籍的活动为主的日记。最初,在1945年11月1日上海《大公报·文艺》上,开始连载发表郑先生写的《求书目录》序;从11月13日起至12月24日,该报连载发表了郑先生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的日记。后中辍。1983年5月,《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重新刊出;同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谛书话》第一次收入书中。郑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求书目录》长序中说:“我这部‘目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从二十九年(按即1940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从这句话中可知:《求书目录》是从他的“原始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抄写成专题日记时当然会有润饰。郑先生原来的发表计划是从1940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

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孤岛”沦陷之日)止,整整两年。但他在开始发表时,似乎就已隐隐预感到此事可能有始无终。可惜不幸而言中,后来人们看到的《求书目录》仅仅只是他原计划发表的约二十四分之一而已!我们从今存1943年5月26日及其他日子的日记中,还可见到写着“写访书目录一则”,可知这个日记名称他在抗战时期就已想好的(而且他后来还把“访[求]书目录”与日记分开来写),还可能一直记到抗战胜利为止。

《求书目录》为什么在报上中止连载呢?1945年12月30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一则《小启事》:“郑先生的《求书目录》不再在本刊连载,编者除觉得对读者抱歉之外,深感本刊篇幅的狭窄。”同时还附了郑先生的一封信:“编者先生:《求书目录》,篇幅甚多,恐非数月所能刊毕,而《文艺》须数日始得一见,刊载此类长文,似不甚相宜。请于即日起,停止刊出。将来当移登他报或篇幅较多之月刊上。”信后署“郑振铎启,十二月廿六日。”可知是郑先生自己要求停刊,原因是发表得太慢了。我们看那篇长篇序文,该报是在十一天时间内分八次连载完的;而后面的日记,已发的比序文的字数要少,却花了四十二天的时间。每次发的字数越来越少,时间隔得越来越长,所以郑先生想换个地方了。但时隔五个月,1946年6月1日《上海文化》月刊第五期上,才见发表了《求书目录一则》,并附有该刊《编者赘言》:“郑振铎氏之《求书目录》,一部分载于复刊后之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嗣因《文艺》篇幅减削,未能刊完。兹由郑氏就未刊稿中亲选一则专交本刊发表。单行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郑先生正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我估计他因而无暇继续整理《求书目录》了。预告将在商务问世的这部大书,后来亦未见其出版,而且迄今连其原稿或原始日记也竟未发现!难道又已散佚了吗?这又是一件令人万分遗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上所刊的一则《求书目录》,为紧接着《大公报·文艺》上已刊的最后一天日记的第二天1940年2月5日,可惜在《新文学史料》及三联书店一书中都失收

了。)但有线索证明,至少直到1961年,犹有部分原始日记存世(详见下述)!

另外,郑先生生前出版的《西行书简》,其实也是逐日记述的。性质与《欧行日记》相似,原先也是寄给高君箴夫人看的。不过,作者既然取名为“书简”,我们就不收入他的日记全编中了。

三

郑先生逝世后,在三周年纪念日之际,1961年11月号《北京文艺》总第八十五期上,发表了吴晓铃先生整理摘抄的《西谛日记钞》,计1940年四天(1月4日、5日、15日、23日)、1958年七天(10月1日、3日、4日、12日、13日、15日、16日)。其中1940年的四天日记极值得注意!因为郑先生1958年日记原件今存,而1940年日记原件已不知去向。这四个日子,虽均已包括在已发表的《求书目录》内,但两者内容一比照,就可以惊喜地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1月23日摘录的内容,为《求书目录》所全无!这就证明当年郑先生确实有过比较详尽的原始日记。今仅见这四天日记的摘抄(每一天日记中都有省略号),但在国家图书馆特藏室的目录中和郑先生的家中,都已经没有1940年日记的痕迹了。吴晓铃先生已故,我们已无法了解他当年是从什么地方抄来这四天日记的(1958年的日记则应当是从北京图书馆保存的原件中抄录的),为什么只抄了这样四天?他抄录之后原件又去了哪里?我们现在只好祈祷这些极其珍贵的日记原件还保藏在天壤之间,有朝一天能重见天日,公布出来!因为它绝不是一般普通的日记,而是写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年头,主要内容是记述郑先生如何拼死保护我民族珍籍文献的英勇事迹的。这是郑先生一生中最动人的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爱国主义思想价值,更不用说在古籍文献学等方面也有着极重要的学术价值了。在本书中,我们只能将仅见的这四节原始日记片段重载于《求书目录》之后,

愿读者珍视之！

又过了二十多年，人们从1982年2月《文献》第四辑发表的刘烜先生的《郑振铎〈日记〉手稿》一文中，才第一次了解到在北京图书馆（后改名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珍藏着郑先生的一些日记，并得以读到该文中引录的一些精彩片断。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自选的课题正是郑振铎研究，因此我便立即赴京调查，从郑尔康先生处了解到，连他都不知道，也没看过自己父亲的这些日记。他说，郑振铎先生逝世后，家属捐献藏书，是遵照其遗愿；至于那些手稿和日记，却不是家属主动捐献的。据说，当时康生对郑先生的秘书下过指令：对郑振铎留下的所有文字稿，哪怕是一张纸，也都得全部查封上交。大概后来那些日记就转到了北图，具体过程并不清楚。尽管如此，尔康先生对父亲这批手稿能珍藏在北图感到欣慰。他对我查阅这些日记和手稿表示热情支持。

然而我在北图查阅时，却不是那么顺利。我是连续好几年一次次上京，才陆陆续续通读了全部郑振铎的日记及部分其他手稿的。当时，除了须有正规的学术单位的介绍信以外，还必须得到北图善本部领导的批准。为此，我与北图善本部的先后几位领导李致忠、薛殿玺等先生硬缠软磨，感动了他们，并结下了友情。我至今还保存着几页他们写的“批条”，可留作纪念。当年他们为什么不愿爽爽快快地将郑先生日记让我看？现在我回想起来，有很多原因：

一、郑先生日记，与其他人的日记一样，什么都记，其中当然涉及一些自己及他人的隐私，或一些不宜公开的内容，作为保管单位，确实是不好随便让人看的。（但我从一开始便得到郑尔康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多次为我亲笔写了介绍信，所以北图在这方面的顾虑就少了一点。）

二、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在学术界毫无名气，李、薛他们也不了解我到底是为了认真地做研究呢，还是出于好玩、猎奇而想看。（这一点，他们在与我接触较多以后才了解。）

三、郑先生虽然是一位大学者，经济收入也不少，但他对自己却十分俭朴，人们难以想象，他留存的正正经经的硬封面的日记本，也就是三四册而已；其余，有的是记在小台历纸的背面，有的记在打孔的活页纸上，有的记在一般的竖行的笺纸上，甚至有的记在自裁的小纸片上。所以，北图善本部负责人开始同意我看的便是“精装本”，对那些只是用一根线简单装订起来的“毛装本”甚或是散页的日记，他们就很不愿意拿给我看了。（后来在我的“韧”的坚持下，终于同意我借阅，工作人员每次在出库与入库时都得一页一页地数过。我至今仍感歉意！）

四、当年，郑先生的学生吴晓铃先生与北图因为借书（大概还是郑先生捐献的书）的事发生矛盾，吴先生在冲动下还骂了粗话（此事李致忠先生，甚至吴先生本人，都对我讲过），因此当我带着尔康先生的介绍信去北图查阅郑振铎手稿、日记时，他们提起此事仍很生气，这也多少影响到我的借阅。（但是，他们毕竟对郑振铎先生是极为敬仰的，同时也认为郑先生家属是很讲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刘烜先生之后，第二个通读了郑先生的日记；而且据北图的同志说，刘先生还没有我看得全（我也发现了刘文中有一些地方是说错或遗漏了的）。

我在这里这样啰唆地重提这些往事，一是想让读者知道，我当年查阅、研究郑先生的日记，是很不容易的，是付出了辛劳的；二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乃是一段值得留恋的治学经过，我至今对当年北图的李、薛等老师心怀感激。那时候上图书馆看东西，虽然有时不太便利，但至少还没有沾上如今那样的铜臭气；据说现在在一些图书馆查阅善本甚至胶卷，都得收“资料费”呢！

四

我在北图查阅郑先生日记及其他手稿时，限于时间十分紧张，只能挑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匆匆摘录。由于我当时对日记中涉及的某些人或事还

不大了解,也有些较重要的内容被忽略了而未抄录,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机会从容地研读,并把日记整理发表。郑尔康先生对此十分支持,我后来便请尔康先生向北图要求拍摄郑先生日记的缩微胶卷。北图的领导非常有情有义,他们研究后,不仅欣然同意郑先生家属的要求,而且还全部免费。又由于郑先生有的日记原是混在他的其他的札记中的,有的我在读胶卷时又发现有漏拍的,所以后来又几次请他们给予补拍,北图的同志都不厌其烦地给予满足。因此,我在这里必须对北图(国图)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尔康先生得到胶卷后,立即很信任地全部交给了我。于是我便开始重读和整理。但是,我家里没有缩微胶卷的放大阅读器,连我任职的大学的图书馆也没有,我只能凑在台灯下用肉眼阅读和抄录,其劳动的艰苦性就可想而知了。但当时我还年轻,凭着对郑先生的崇敬的激情,将1943年至1948年的日记陆续整理了出来,先后发表于1989年至1991年的《出版史料》及《新文学史料》上。但随后这一工作便停了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发表郑先生日记最热心的刊物《出版史料》,后来主要因为经济财力方面的问题被迫停刊了(近年已恢复)。二是我先整理的那几年的日记,郑先生或是记在台历背面,或是写在小笺纸上,字写得较大,缩微胶卷每张拍一二页,我用肉眼勉强可以看清;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多为记在开本较台历大的日记簿或工作笔记簿的活页纸上,字又写得较小,缩微胶卷每张拍两页,我用肉眼就根本看不清楚。因此,整理工作就只好停顿下来。谁料这一停,十多年时间就如流水般地逝去了!

尽管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学术研究(其中也包括对郑先生的研究)等工作,不能算是虚度光阴,但未能整理出一部《郑振铎日记全编》,我一直深感歉意。一天,尔康先生告诉我,山西古籍出版社的负责人多次主动与他联系,希望能出版《郑振铎日记全编》。这就促使我早日重新上马继续做这件工作。但用肉眼读胶卷的办法当然再也不能做了,于是便

请上海图书馆将缩微胶卷放大翻转复印,钱花得不少。本以为这样一来整理起来问题就不大了。谁知由于有的日记原件字较小,胶卷又以两页摄为一张,且胶卷因年久也有所模糊,所以根据复印件来整理仍然是一种很吃力的活儿。加上我的年龄又虚长了十多年,在单位里的科研和教学的工作量也大为加重,因此,郑先生日记的继续整理工作进行得也不快。期间,我的夫人见我实在太忙,也为我做过一些抄写。在出版社张继红及贾娟同志的时常督促下,终于在2004年年底,完成了整理工作,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

五

本书的整理工作力求做到“全”。如《求书目录》,迄今为止在所有收入它的书里面,都缺漏了最后发表于《上海文化》上的2月5日的那一天,本书首次将它补上。又如,以前我整理发表的1948年日记中缺了6月29日、30日两天,乃因胶卷中漏拍,这次也补上了。又如1955年6月24日这一天日记,是我在查阅郑先生的工作笔记中发现的,当时抄录了下来,现在也收入书内。还有前面讲到的1940年残存的四天日记等。这里顺便还可补充一条:我还记得曾在北图善本室看到一函两册、裱装考究的郑先生手稿,上题:“所见古书录/郑振铎藏/文化部赠”。这是连郑尔康先生都不知道,当然也没见过的。在其中,我见到有一则残稿,当也属于残存的访书目录,为九月八日所作(今经我对照《顾廷龙年谱》,此则目录很可能写于1943年)。当时我匆匆抄录,可惜未抄全,今记于此:

九月八日,阴雨。秋凉已深,可御夹衣矣。晨,冒雨至来薰阁,知其新收得明末刊本《册府元龟》三部,一出北平(余氏读已见书斋物),一出济南,一则新由鄞县收来,欲假来一阅。出自济南者,已为顾起潜持去。乃假得北平本及鄞县本首二册归,穷一日夜之力对勘

之,并录其序。……

郑先生所录之序我未抄。最后,他又提到一较普通的清版书(书名我已忘却),并谈到治学之道,当时我读了很受用,故也记下了:

此不难得之书,其板本亦复有积疑不决者。使非征见初印、后印诸本,则此疑终不易解。谈板本者惟有博见广闻,多收异本耳。窗外雨声,淅沥未止,秋灯夜抄,手为之疲。

由此可想见,如果有条件再认真查索一下的话,郑先生的日记应该还有再发现一些的可能。这里,我又想起二十多年前一件与郑先生日记有关的事情,忍不住也写出来,或许今后会成为一则“掌故”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北图查阅郑先生日记不太顺利的时候,曾去拜访过如今已故的鲍正鹄先生。鲍正鹄先生原是我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的老师,后调北图工作,当时已调中国社科院工作,但仍住在北图的干部宿舍楼。鲍先生听了我“诉苦”后,说:“他们这样做就不大对了。郑先生有的日记,还是我偶然发现的呢。”原来,当年郑先生家属遵照郑先生遗愿将他所有的藏书捐献给北图时,连郑先生书房里的书橱、写字台等也一起搬来了(陈按,郑先生的写字台,不知今尚存否,它应该算是“文物”了)。一次,鲍先生要用那张写字台,在清理抽屉时就发现了一些郑先生写的东西,一看,还是他的日记。鲍先生便让馆里珍藏了起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心想:好玄(悬)啊!如果不遇上鲍先生这样的慧眼,这些日记不就化为云烟了吗?

为尊重和保持日记的原貌和真实性,本书的整理力求保持原样。一些字、词的写法,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许不规范,但能不改就不改。对原稿中有个别空缺处或字迹模糊不清的,则以□代替;对原稿出现的笔误、脱

漏、衍文之处,分别以[]、[]、< >补正。

有的地方曾被后来的编辑改动过(如《欧行日记》的序原署用民国纪年,被改成公元;《求书目录》中提到陈立夫先生的地方,被改成教育部),一经发现,都恢复原样。只在极个别的有必要的情况下作了很节制的删节,如《欧行日记》中有一处涉及国家对外关系的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本早已删节),以及作者未刊日记中少许不宜或不必公开的内容。这些都与郑先生家属取得过共识。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从胶卷整理的日记中,有个别文字看不清,尤其是外文,有的写得太草,有的本身写法不规范,甚至有用英文来拼写其他语种的地名、人名的,我在尽量“依样画葫芦”时很可能写错。虽然我身边精通外语的朋友很多,我也曾向他们请教过,但仍不敢保证无误。还有一个是注释,我的整理工作本是断断续续的,也没有按照郑先生每种日记的先后顺序来做,因此那些注释肯定有前后照应不周的问题。现在虽然我又重看、修订了几遍,仍可能有不妥的地方,有些人名、事情则至今注不出来,所有这些,都请高明指正。

六

以上,是2005年我为山西古籍出版社写的,后印载于该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卷首。现在重读一遍,觉得不必作什么改动,但需再添写几句说明。

《郑振铎日记全编》出版已经超过十年,书店早已售罄,曾有不少朋友问我能不能再版。我知道现在出版社任务都很重,再版并不是容易的事,就没向原出版社提,也没与其他出版社联系。可是2016年的某一天,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编辑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商务印书馆想重版此书。这真是意外之喜!本来,商务印书馆就对我有恩(拙著《郑振铎论》曾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两次),更不用说郑振铎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

作过十年,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郑先生的日记能在商务印书馆重版,是最令我感到高兴的!

本书这次是作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的“同仁日记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还有其他人的日记,书名没有“全编”二字,因此,本书就径称《郑振铎日记》。

本书的山西初版本后来发现略有一些错字,这次作了修订。注释也作了一些修改增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请了精通多种外语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我的老同事、学校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聘编审支顺福兄,帮我审核了书中的外语词汇,纠正了不少舛误,在此特别致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山西初版本的卷首编辑曾印上四段巴金《怀念振铎》中的话,但其中第三段话并不是纪念郑振铎的,我曾向该社指出过。

最后,这次整理、修订工作荣幸地列入了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中,得到了上外科研处的大力支持。

我深深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福康